

国别与地区

再议“海德尔现象”

张莉

[摘要] 1986年后,海德尔全面掌控了自由党的最高领导权,为“海德尔现象”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海德尔现象”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对腐败的传统主流政党的政治抗议、右翼民粹式的大众动员策略和反对全球化的奥地利民族主义。“海德尔现象”持久不衰是奥地利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变迁与模糊不清的民族认同等历史和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兴盛助长了它的发展。

[关键词] 极端右翼民粹主义;奥地利自由党;“海德尔现象”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0)04-0066-72

在1999年国民议会大选中,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FPÖ)闪电般的崛起彻底地改变了奥地利政治格局,奥地利由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其领导人约格·海德尔(Jörg Haider)所担任的职务虽然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州长的职位,但他却牢牢地控制着自由党,成为在奥地利和欧洲政坛上具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知名人物。自1986年以来,在海德尔的领导下,自由党善于煽动公众敌对情绪,鼓吹奥地利民族主义,把选民的敌对和反抗目标越来越多地引向腐败无能的政治精英阶层、外来移民以及经济全球化,它把东拼西凑的极右翼理论与灵活多变的民粹式大众动员策略相结合,把自己塑造成为西欧最成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中外舆论称之为“海德尔现象”。“海德尔现象”也成为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代名词。我国的学者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大讨论。^[1]他们大都对“海德尔现象”进行了比较简单的描述,简要地分析了它形成的原因以及对奥地利和欧洲政治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同盟(Bündnis Zukunft Österreich:BZÖ)在2008年全国大选中赢得了29%的选票;它们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17.3%的选票和2个席位(参见表一),掀起了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

潮。因此,本文并不局限于对1999年事件的讨论,而是重新审视“海德尔现象”形成过程和主要表现形式,深入探究这一现象持久不衰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全面研究欧洲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海德尔现象”形成的组织基础

“海德尔现象”的形成与海德尔当选自由党主席并将权力集于一身的过程密切相关。1986年,海德尔当选为自由党主席后,通过组织严格等级化和权力集中化,全面掌控了自由党的最高领导权,这为“海德尔现象”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奥地利自由党于1956年4月7日在维也纳成立,其前身为奥地利极右翼政党“独立者联盟”(Verband der Unabhängigen)。在1986年之前,自由党仅能获得6%左右的选票,是奥地利政坛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主席诺伯特·施提格(Norbert Steger)热切地希望把自由党塑造为奥地利版的德国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吸引奥地利正在形成的白领阶层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中间选民。在1983年国民议会选举中,尽管自由党只获得了5%的选票,但由于党主席施提格当选为副总理,自由党第一次参加联合政府的组阁。

1986 年,海德尔在当选为党主席后采取两项措施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力地位:其一,南方政策。海德尔付出大量心血在奥地利最南部的凯恩腾州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为自己在党内提供了强大的个人支持。随着自由党在各级政府和议会中的力量不断增强,在政府担任公职的自由党成员在党内决策机构的比例稳步增长,自由党组织的关注点也从长期战略、纲领发展、成员发展,转变为短期策略、大众动员、选举竞争。这些措施都较为成功地增加了地区党支部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海德尔的凯恩腾州根据地以及上奥地利的党支部。自由党在 1999 年获得凯恩腾州州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使党主席海德尔在自由党内的巨大影响力和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得以加强,即使日后辞掉党主席而退居凯恩腾州州长,他依然牢牢控制自由党在全国的发展方向。

其二,海德尔推进党内集权化进程,在党内建立了独裁式领导,把最高决定权集中于党领导人的手中。在海德尔当选为党主席之后,通过调整组织结构,在党内拉帮结派、组建忠于自己的议会党团,强制推行领导人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实施党内法庭、忠诚宣誓、限制言论等措施,使党主席拥有制裁和处罚所有党员的最高权力。同时,海德尔还降低各级基层党组织在决策机构和民主程序中的影响力,并放弃了依据工作业绩提拔干部的原则,把对自己的忠诚作为维系领导关系的唯一纽带。海德尔让自己周围围绕着一批献媚之人,他自己就像封建领主一样任意安排党内的人事任免。^[2]他还常常利用与媒体的亲密关系,在内部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前,提前透露党的政治立场和人事任免信息,从而造成无法变更的既成事实。通过这些措施,海德尔夺取了最高领导权 and 实现了对自由党的全

面控制,自由党也转变为由党主席严格控制的领袖党。^[3]

海德尔通过这两项措施在自由党内建立起金字塔式的等级严格的权力结构。官员的频繁轮换和决策机构周期性的改组,成为海德尔控制下的自由党的“不断革命”^[4]的主要内容。海德尔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更加关注和热衷于制定民粹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短期发展策略以及短期选举方案。自由党转变为适应政治动员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和选举的成功(参见表一)。在 1999 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以 26.9% 的得票率赢得了奥地利第二大党的地位,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由社民党和人民党主宰的奥地利政局,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三党鼎立新格局。自由党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引发欧洲政坛的轩然大波。国内举行声势浩大的“星期四集会”抗议游行,欧盟 14 个成员国联合抵制和制裁奥地利,使奥地利陷入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内政和外交的双重危机。

2000 年至今,自由党一直处于权力斗争和组织分裂的状态。2005 年 4 月 4 日党内矛盾全面爆发,党主席乌祖拉·豪布纳(海德尔的姐姐)和时任凯恩腾州的州长海德尔从自由党分裂出来,成立了奥地利未来同盟。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当选自由党主席。2009 年底,海德尔在车祸中丧生,但施特拉赫接过海德尔的大旗,他带领自由党展开了极端的竞选运动,把动员的重要目标放在蓝领选民阶层上,将议题重点集中在犯罪和移民问题上,打出“维也纳不能成为伊斯坦布尔”、“要用德语取代听不懂的玩意儿”等竞选口号,以极端排外的形象引人注目,继续强化“海德尔现象”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表一 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联盟在 1983—2009 年间所获得的选票和议席

		1983	1986	1990	1994	1995	1999	2002	2006	2008	2009
自由党	得票率 %	5.0	9.7	16.6	22.5	21.9	26.9	10.0	11.0	17.7	12.7
	席位	12	18	33	42	41	52	18	21	34	2
奥地利未来同盟	得票率 %	—	—	—	—	—	—	—	4.7	10.8	4.6
	席位	—	—	—	—	—	—	—	7	21	—

注:2009 年为欧洲议会选举

资料来源:奥地利联邦内政部(Bundesministerium F ü Inneres), <http://www.bmi.gv.at/cms/bmi-wahlen>, 参考时间为 2009 年 10 月 3 日。

二、“海德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奥地利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小国,长久以来执行永久中立政策,成为世界上颇为宁静的国家。然而1999年大选后,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和人民党联合组阁,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时隔10年后,自由党与奥地利未来同盟获得了近30%的选票,奥地利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解读“海德现象”。“海德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对腐败的传统主流政党的政治抗议

在1986年当选为自由党党主席后,海德利用“瓦尔德海姆事件”^[6]迅速地把自由党极右化,也为自由党赢得了广泛的传统的右翼选民支持。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建立大联合政府,试图在政治上孤立海德和遏制自由党的发展。这让海德恼羞成怒,他公开挑衅奥地利传统的主流政党,攻击比例代表制中的政党分肥,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执政党政治精神的堕落、浪费和滥用税收、贪污腐败,从而捞取政治利益。与此同时,海德把自由党描述为清白廉洁、充满活力的变革力量,把受到孤立的自由党比喻成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他在1986年接受电视采访时批评社民党说:“社民党现在正在重蹈纳粹的覆辙,以前纳粹的标语是‘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不要和犹太人说话!’而现在社民党人说‘不要和自由党人说话!’这是一种不民主的、不尊重人类尊严的做法。”^[6]自由党的新闻稿曾说:“旧的政党,即人民党和社民党,已经输掉了领导这个共和国的权力。官僚化、不民主的议会制度,以权谋私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导致了经济的崩溃,他们要为此负全部责任。”^[7]自由党标榜自己是这种腐败体制中唯一的反对党,受到了传统主流政党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从而煽动选民的愤怒情绪。

海德用形象的、夸张的、简单的语言把复杂而抽象的政党分肥制表述得清楚明白。他别出心裁的幽默和嘲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戒心,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心直口快的反传统的形象,因他经常参加狂欢舞会的装扮被称为“现代罗宾汉”。自由党摆脱了传统政治道德的约束,把一切问题简单化,使用攻击性的言语、公开的挑衅、露骨的煽动和夸大其辞的误导等宣传手段,把自己塑造成了年轻的、反对腐败政党体制的抗议党形象。

2. 右翼民粹式的大众动员策略

苏东剧变彻底地改变了奥地利的地缘政治。冷战

结束、两德统一把奥地利重新推回到欧洲大陆的中心,迫使它不得不面临西欧强国的经济竞争。南斯拉夫解体,相继席卷了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以及后来的科索沃的政治争端,都让奥地利不得不对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及大量涌入的东欧邻国的难民。经济全球化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动摇和瓦解了奥地利社团主义的社会伙伴管理模式。因此,自由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在少数地区继续保留作为抗议党的政治策略,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极端右翼民粹式大众动员策略来分化两大主流政党的选民,其主要敌人也随之变为东欧难民和外来移民。^[8]

右翼民粹式的大众动员策略主要是指海德利用蛊惑人心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等煽动性宣传方式将奥地利民众政治化,激发出他们前所未有的献身精神和忠诚感,成功地煽动起敌对情绪,最大化地操纵普通选民,达到获得政治权力目的的一种动员方式。这种动员策略最先在奥地利东部获得成功,在自由党势力一直很薄弱的维也纳也取得了惊人的选举成绩。奥地利的东部地区最直接、也最强烈地感受到冷战结束带来的冲击,自由党反复强调难民和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给公共住房带来巨大的压力,还使本国人民失业增加,特别强调维也纳地区说德语的儿童数量已经下降到20%,成为少数民族。在1991年维也纳的市议会竞选中,奥地利自由党获得了16.2万张选票(得票率从1987年的9.7%上升到了22.5%),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人民党(得票率从1987年的28%下降到了18%),几乎每五个选民中就有一个投票给自由党,这是自由党首次在海德尔家乡以外的州议会选举中超过人民党,在全国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自由党打着“追捕社会福利诈骗犯”和反对外来移民的旗号,将势力逐渐渗透到社会民主党在斯蒂里亚州和上奥地利州工业区的核心选区。^[9]1992年的秋天,自由党提出了“奥地利优先”的议案,建议修改宪法,宣布奥地利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移民国家,还在教育、医疗卫生、公共福利、住房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外来移民的具体措施。1994年,自由党在三个州议会选举中崛起,在凯恩滕州,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几乎平分秋色。在1995年的全国选举中,自由党获得了22.5%的选票,这是第三党自奥地利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全国大选中获得的最好的成绩。自由党越来越多地吸引低技能的、来自农村的和以蓝领工人为主的中下社会阶层的支持。1994年支持自由党的蓝领工人几乎是1986年的两倍,这在年轻工人中尤为明显,

尤其是男性年轻工人(男性工人:38%;女性工人:21%)。^[10]由此可见,自由党转变为以(蓝领)工人阶级

为主体选民的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党(参见表二)。

表二 1986—2008年奥地利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选票中蓝领工人的比例

	1986	1990	1994	1995	1999	2002	2006	2008	
								技术工人	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
社会民主党	57	52	47	41	35	34	47	34	34
自由党	10	21	29	34	47	16	18(2)	32(6)	21(18)

注:2006年自由党获得18%蓝领工人的选票,奥地利未来同盟获得2%。括号内的数字为奥地利未来同盟所获得的选票。

资料来源:奥地利联邦内政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es), <http://www.bmi.gv.at/cms/bmi-wahlen>, 参考时间为2009年10月3日。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Kurt Richard Luther, "The Austrian Election of 2008",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09, Vol. 32, No. 5, p. 1056.

由此可见,为了适应右翼民粹式动员方式,自由党更多地制定和采用快速有效的政治策略和短期的竞选纲领,作为它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和竞选的行动指南。在此情况下,1986年制定的《萨尔茨堡纲领》^[11]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自由党从1993年开始酝酿制定新的政治纲领。

3. 反对全球化的奥地利民族主义

随着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海德尔敏锐地察觉到政府经济紧缩政策导致社会不安和选民的怀疑态度,开始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1997年10月30日,自由党正式公布新的政治纲领——《奥地利协议》,抛弃了《萨尔茨堡纲领》所承认的少数民族文化特性和文化多元性,更加强调奥地利本民族的利益,严格区分本土少数民族和移民少数民族,明确细化各民族权利的差别,并以此作为国民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的依据;严格限制外来移民,迅速阻止新的外来移民入境,加强奥地利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尤其是打击外国人的刑事犯罪行为;强调建立“符合生态和社会福利原则的公平的市场经济”,^[12]反对奥地利加入欧盟,反对欧盟东扩和过早使用欧元。

在新的政治纲领的指导下,自由党又迅速转变为尊重传统民俗、保卫奥地利民族特性的民族主义的代表。奥地利政府为了达到欧元区所需要的财政和货币标准,施行了一系列紧缩财政的改革措施,海德尔抓住一系列国际收购和公司倒闭事件,大肆指责奥地利政府“贩卖奥地利”。他指责社会民主党与欧洲的政治精英同流合污,企图将奥地利带入险恶的多元文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这将直接威胁到奥地利民族的生存。用海德尔自己的话说,“特别是随着欧盟和奥地利政府主导的欧盟东扩,经济衰退会越来越严重。”^[13]从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交通建设到奥地利慈善无记名银行账

户,欧盟及其工作人员变成了奥地利自由党煽动言论的攻击目标。不断增加的社会需求、日益严峻的经济竞争、逐渐减少的资源等等问题加剧了奥地利人心中潜在的排外情绪和欧洲怀疑主义。与此同时,自由党开始提倡奥地利民族主义,保护奥地利独特的文化遗产和特性,这些都源于地方传统的小镇沙文主义和田园式(阿尔卑斯型)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和保护奥地利文化传统的呼声在选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自由党转变为“弱势人民利益的倡导者,代表奥地利人民的利益而非欧盟的利益。”^[14]

自由党强烈敌视外来移民,指责他们是威胁社会治安的潜在罪犯和社会福利的窃取者,严重危及了奥地利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海德尔曾使用所谓的“Überfremdung”(过度外国化)来描述外来移民的危险,他说:“维也纳公立学校的状况是如此之糟,导致南斯拉夫族裔的母亲要让自己的孩子转出这些学校,因为在教室里坐着太多的土耳其人。”海德尔还宣称移民导致犯罪率上升,大力煽动种族仇视。自由党散发传单警告市民:“维也纳不能成为芝加哥!”用有关芝加哥的老故事告诫奥地利人民:种族大熔炉,一个充斥着歹徒、谋杀、大混乱的城市。海德尔在谈及奥地利难民政策时反复强调“这是进口刑事罪犯”。

三、“海德尔现象”形成和盛行的动因

在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并非奥地利独有的现象。奥地利自由党正是利用了这一政治潮流,紧紧地追随选民的意志,并将这些意志凝聚为有组织的、强大的政治力量,随着政治环境和社会危机程度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使自己成为西欧最成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及

“海德尔现象”持久不衰不仅仅是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推波助澜的结果,也深深地根植于奥地利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变迁与及模糊不清的民族认同之中。

1.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

苏东剧变、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使西欧社会的不满和恐惧情绪日益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劳动力市场危机、民主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交织造成了西欧社会日益失控和失序,西欧各国政府难以控制和扭转日益恶化的宏观经济形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机煽动民众,扩大自身影响,成为西欧政治舞台上在中右、中左主流政党之外一支无法忽视的抗议的政治力量。在2007年的国会大选中,瑞士人民党获得29%的选票和62个席位。比利时弗拉芒集团被禁后,成立了弗拉芒利益党,其支持率稳定在12%左右。意大利北方联盟在2008年获得8.3%的得票率,进入联合政府执政。丹麦人民党以13.8%的得票率参与执政。奥地利自由党凭借自己是奥地利唯一的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政党,打着反对外来移民的旗号,获得那些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持怀疑态度选民的支持。它所宣称的民族主义在被人民党所抛弃的传统保守主义选民当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也受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的热烈欢迎。这些政党宣扬新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地区分裂主义等右翼意识形态,夸大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夸大自己在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方面的天然优势,贬低所有与自己不同的其他种族、民族或社会群体。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使用排外、极端民族主义以及蛊惑式民粹主义动员策略,紧紧抓住若干政治难题,如非法移民问题、打击刑事犯罪维护法律和秩序等问题大做文章。尽管它们提不出任何具有可行性的执政方案,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这些策略成为它们成功捞取政治资本以及政治选票的手段。右翼民粹主义不仅是西欧各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呼应,不断地扩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的政治影响力,成为威胁西欧民主制度的一股逆流。这一潮流助长了奥地利自由党的势力。

2. 奥地利政治和社会变迁为之提供巨大的机会

首先,独特的“奥地利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政治合法性危机,为自由党提供了政治机会。二战后,奥地利逐渐建立起以政党分肥制和社会伙伴关系为特征的奥地利模式。在政治上,两个主流政党,即中左的社民党和中右的人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长期联合把持奥地利政坛,在经济上,政府将第三帝国的所有

企业国有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社会伙伴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定机制。主流政党与利益集团相互渗透、高度交织,从而形成了完备的政党分肥制和庇护体系,传统的两大党按照成员的多少、政治影响力和选举结果分割权力,它们不仅仅在所有国家机关、公务职位、劳动力协会以及国有企业分配各自的利益配额,到70年代末扩展到奥地利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经济停滞和奥地利经济状况恶化,两大党之间的讨价还价、妥协或扯皮导致政府和议会的权威被削弱,甚至造成严重政治合法性危机,都加深了奥地利人民对主流政党精英的失望。自由党正是紧紧抓住选民的不满情绪,把自己定位为抗议党,代表“平民百姓”反抗傲慢专横的、腐败的政治精英,从而在两大党组成第二次联合政府期间崛起。

其次,奥地利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分化,为自由党的崛起和盛行提供了政治空间。在二战后,奥地利主流政党极力地压制和打击奥地利的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而自由党传承了奥地利“第三阵营”(Dritte Lager)的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天主教会、教权主义的保守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赢得了许多学术界和商业界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一些反对天主教和支持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地区,如上奥地利和凯恩滕州成为自由党坚实的堡垒。

随着奥地利的社会伙伴关系体系的完善和社会民主党主席布鲁诺·克赖斯基推行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受过高等教育的、富有竞争和革新的精神的“新中间阶层”在奥地利壮大起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他们由于拥有创新意识、拥有良好人际关系而继续获得巨大利益,拥护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反对政府干预和支持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相反,那些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工人,尤其是受到经济全球化威胁的底层蓝领工人,开始反抗全球化并寻求强有力的保护,成为反对和敌视外来移民的“福利沙文主义者”。奥地利的政党体制无法满足和代表这两个新生群体的利益,频频爆发的政治腐败和丑闻加深了他们对政治精英的失望。因此,他们把选票投给了给自由党。

3. 模糊不清的奥地利民族认同是“海德尔现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奥地利民族认同通常与过去留下的日耳曼历史遗产相关联。远在奥匈帝国时期,奥地利就存在着强烈的德意志种族主义,二战期间,奥地利德意志种族主义急剧膨胀,促使德奥合并。在经历了与德国的矛盾关系、世界大战的毁灭、冷战中东西方对峙前沿及经济全

球化和欧盟一体化等种种痛苦和磨难后,奥地利社会中潜藏的纳粹势力、难以愈合的政治创伤、政治精英的勃勃野心以及在多元文化竞争中潜在的种族主义。所有这些都造成这个民族思想的各种冲突和模糊不清的民族认同,这也成为“海德现象”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战后,战胜国对奥地利纳粹罪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算,但奥地利人没有真正反思和忏悔在法西斯的侵略和屠杀中的帮凶行为,也没有彻底地对自己的战争罪行与种族灭绝罪行进行检讨。尽管1945年后,奥地利右翼虽从未公开赞同与德国合并的观点,但它紧紧抓住奥地利的泛日耳曼民族认同,并逐渐把它从种族特征转变为文化特征,说德语的民族就意味着拥有优越和高级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奥地利右翼极力地减轻和否认纳粹集团所犯下的罪行,混淆历史事实。这些都使奥地利泛德意志民族情结的矛盾心理变得更加复杂,并逐渐渗透到奥地利民众的主流意识中。因此,海德现象利用“瓦尔德海姆事件”以及其他政治运动,轻而易举地煽动起选民心中潜藏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敌对防范的态度,使民众在政治上支持自由党。

结束语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以自由党为代表的新一轮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西欧再次卷土重来,“海德现象”又呈现出两个新的发展方向:其一,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仅要在选举中赢得更多的选票,而且开始思考和学习选举获胜之后的夺取权力和参与执政的问题。在受到全球经济危机严重打击、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政治不断右倾化的奥地利和整个西欧,它们也强调对全球经济以及国际金融加强监督和干预,推进关系到下层人民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福利体制的改革,致力于从抗议党到负责任的政党的转变,从而谋求政治权力。其二,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试图欧洲化。奥地利自由党与其他国家的获胜的右翼民粹政党联系,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的信息交流和协调合作的国际网络。2009年欧洲议会之后,它们开始推动在欧洲议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党团的讨论。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复兴再次引起了西欧人民对民主政治深深的忧虑和担心。

著名学者约瑟夫·熊彼特曾把民主定义为“这样一种达到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使人民通过选举将集合起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人,自己来决定争论的问题,从而实现共同的幸福。”^[15]西方民主主

义者普遍认为多党议会代表制是当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民主的概念包含着“理想”与“现实”两个冲突因素。就民主体现的政治理想而言,它代表人民主权、平等与自由、人民有同等机会参与政治;普通大众期望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以及维护社会公正。然而,现实政治中的民主是各种利益集团通过代议制和周期性选举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政治竞争。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继续恶化了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整体形势,使这些国家陷入二战以来严重的信任危机,也加剧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海德现象”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认为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变成了少数政治精英愚弄、欺骗和统治广大民众的一种手段。它们认为民主应该更多意味着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声称自己代表了普通人民的共同意志,把民众关注的社会问题简单化、绝对化,借机煽动民众来扩大自身影响。它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反映了当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危机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外来移民冲击以及民主政治的漏洞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它们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政党”,只要产生这些问题的时代背景不变、经济和社会状况继续恶化,这些政党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在实行议会多党制、比例代表制的西欧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它们依然拥有极为有利的时机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继续在本国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注释]

[1] 在1999年奥地利大选之后,国内对“海德现象”展开了大讨论,主要代表作请参看:高华:《“海德现象”的启示》, <http://www.iwep.org.cn>;郭业洲:《一党入阁 四邻不安 - 奥地利自由党参政的背景和影响》[J],《当代世界》2000年第3期;杨汝生:《奥地利 - 极右翼政党入阁惊煞欧洲》[J],《人民论坛》2000年第3期;孙敬亭:《奥地利自由党上台的根源和影响》[J],《欧亚观察》2000年第1期;周国栋:《希拉克的担忧并非多余 - “海德现象”为法极右翼势力推波助澜》[J],《国际展望》2000年第6期;陈宣圣:《奥地利何处去》[J],《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第14期;舒笙:《奥地利:“海德现象”的危险在于德国问题回潮》[J],《国际展望》2002年第4期等等。

[2] Bailer-Galanda, Brigitte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Haider und Die Freiheitlichen in Österreich*, Berlin: Elefant Press, 1997, s. 115. (《海德和奥地利自由党》,柏林:大象出版社)。

[3] Max Riedlsperger,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rom Protest to radical Right Populism”, Hans-Georg Betz and Ste-

- fan Immerfall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New York: St. Martin, 1998, p. 30.
- [4] Kurt Richard Luther, “Die Freiheitlichen(《自由党》)”, Herbert Dachs, Peter Gerlich and Herbert Gottweis (eds.),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Österreichs-Die Zweite Republik*, Vienna: Manz, (《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的政治体系》, 维也纳: 曼茨出版社) 1997, s. 290.
- [5]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Kurt Waldheim, 1918—2007) 于 1972—1981 年间担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 于 1986 年当选为奥地利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 媒体报道说瓦尔德海姆在二战期间曾经在德国纳粹冲锋队担任军官, 并在巴尔干地区服役, 尽管他一直予以否认, 并成功当选为总统。但“瓦尔德海姆事件”在奥地利引起了关于奥地利在二战期间的角色的大讨论。
- [6] Die Press (《新闻报》), 12 November 1989.
- [7] 海德尔在 1986 年 10 月 11 日的演讲, 转引自 Hubertus Czernin, *Wof ü Ich Mich Meinete wegen Entschuldige: Haider, Beim Wort Genommen*, Vienna: Czernin Verlag, (《我的思想的辨析—海德尔的演说词》, 维也纳: 切尔宁出版社) 2000, s. 99.
- [8] [9] Max Riedlsperger,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rom Protest to Radical Right Populism”, Hans G. Betz and Immerfall Stefa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p. 31, p. 36.
- [10] Fritz Plasser and Peter A. Ulram, “Rechtspopulistische Resonanzen-Die Wahlerschaft der FPÖ”《右翼民粹主义的追随者—自由党的选民基础》,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eds.), *Das Ö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n*, Vienna: Signum Verlag(《奥地利人的投票行为》, 维也纳: 希格诺出版社), 2000, s. 83.
- [11] 1986 年自由党制定了《萨尔茨堡纲领》。由于受到自由主义的“阿特湖集团”的深刻影响, 这个纲领强调维护人的尊严, 充分发挥人的个性, 发挥人的生命力、生活的勇气、自信心和创造力, 围绕“自由”、“人类尊严”、“人民和家园”、“欧洲”等问题进行讨论, 并且应用到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政治议题上。这个纲领宣称自由党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继承者”。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在海德尔的领导下, 自由党加重了极右民族主义色彩, 对底层选民加强了反对外来移民的煽动。《萨尔茨堡纲领》虽然被保留下来, 但由于党内激进民粹主义分子的质疑, 很难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
- [12] 郭业洲:《一党入阁 四邻不安—奥地利自由党参政的背景和影响》[J], 《当代世界》2000 年第 3 期。
- [13] Jörg Haider, *Wof ü Ich Mich Meine*, Vienna: Czernin Verlag, (《我的思想》, 维也纳: 切尔宁出版社) 2000, s. 91.
- [14] Fritz Plasser and Peter A. Ulram, “Rechtspopulistische Resonanzen-Die Wahlerschaft der FPÖ”《右翼民粹主义的追随者—自由党的选民基础》,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eds.), *Das Ö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n*, Vienna: Signum Verlag, (《奥地利人的投票行为》, 维也纳: 希格诺出版社) 2000, s. 227.
- [15]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 吴良健译,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第 312 页。

作者简介: 张莉, 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现为助理研究员, 博士。(北京, 100032)

收稿日期: 2010-04-30

修改日期: 2010-05-22

This application will enhance Japan's statu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politics. China's maritime strategic operation space will be seriously squeezed. Preservation of mar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will face a more complex situation.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similar concern on this matter and make clear our position. Meanwhile, we should make the best use of time to explore these waters, and gradually make full use of this water.

Theoretical Probes

- 55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Positivism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rying from Material First to Concept First by Hua Xiang
- Positivism Methodology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positivism thought and mod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 in the whole Western thinking, which constitute the intellectual basis of empirical methods in IR. On the premise of Positivism's own logic and by reviewing the clues of positivism thinking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sciences, we find that positivism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ly provides "demonstration" approaches, and cannot guarantee the objectivity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shares an equal importance with the historical method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 in demonstration, all of which will find their plac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objects and different scopes.

World Economy

- 60 China, the U.S. and the EU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by Song Guoyou
-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ignifican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ctors. However, the interest convergence, method of interaction and policy focus among these three actors differ in the monetary system, financial system and exchange rate system. China still needs more time to transform its economic power into financial influence worldwide.

Countries and Regions

- 66 Another Comment on the "Haider Phenomenon" by Zhang Li
- Since 1986, Haider has fully taken hold of the highest leadership power of the Freedom Part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Haider phenomenon". The "Haider phenomenon" has three key features: political protests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parties, the right-wing populist mobilization strategy and Austrian nationalism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pasting of the "Haider phenomenon"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uniq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l of Austria, the workings of complex history and vague national identity. It is also fostered by the right-wing populist forces in Western Europe.
- 73 Analysis of the Chakma-Hajong Issue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by Li Jinke & Ma Dewen
- Between 1964 and 1969, the Indian government settled 2748 Chakma-Hajong families in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This action caused a significant impact both on the migrants and the local peopl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idespread anti-migration campaigns against the Chakmas and Hajongs broke out. Today the local people still strongly insist that Chakmas and Hajongs should leave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This unresolved issue is a main factor which may affect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he area for the coming years.